

世界暫停，

10 個人
在服務最重要時，
落實超我服務



他們不停



喬凡尼·卡帕 Giovanni Cappa

急診室內科醫師
義大利帕維亞 (Pavia) 扶輪社

我在義大利北部的一間大學附屬醫院擔任住院醫師。工作的地點是一個大型急診室，規模在義大利境內算是數一數二。我們位於這個巨大風暴的震央位置。

當新冠病毒襲擊義大利時，距離中國的第一批病例通報只有兩個月。每天都有許多研究發表，因此我們每天早上都會進行簡報。關於藥物及呼吸器設定參數的指導方針可能每日改變。我們每天都會發現關於這個疾病病理特徵的新知識，必須因應調整。

頭幾天，我們看到一波波病患湧至。同一個區域內的許多急診室都已經癱瘓——醫院人員受到感染，或是醫院沒有能力救治新冠病毒的病人。因此我們也收治區域內其他地方的病患。我們沒有空床，到處都是病患。我們在一天之內設置了新的急診室，可是缺乏我

們習慣使用的用品，像是管理後勤所需要的電腦。這只是小事，有很多次我們甚至沒有足夠的氧氣設施。

我們必須做出許多困難的選擇。許多新冠病毒病患到院時都無法呼吸。他們呼吸困難，需要呼吸器。我們碰過病患走進我們的急診室後就癱倒在地。大家都很害怕。加護病房少量的床位很快就佔滿。新冠病毒病患住進去不是一、兩天，而是好幾個星期。

過去我們習慣給每個需要的人最好的照護，但此時情況容不得如此。我們必須運用常識來使用資源。我們必須優先照護可能存活的人。這已是災難醫學的範疇。不久後，義大利麻醉師學會發佈指導原則，協助我們做這些決定。

我們會告訴家屬他們親愛的人撐不下去，我們不能讓他們看遺體。他們會哀求我們要與死者道別，可是我們無法答應。這些算是最困難的時刻之一。

我們習慣穿著短袖棉質手術服，真的很舒服。急診室很熱，我們需要四處走動。在

2月底時，我們收到命令說每天都要穿戴全套防護裝備，連續13或14小時。那就像全套盔甲一樣，會讓人流汗。這是很大的挑戰，因為在急診室裡你要快速移動，做出精確的動作，現在你必須穿著笨重的裝備來做這些事。你甚至無法微笑來讓病患覺得好過一些。你失去了人與人的連接。

唯一的慰藉是我們學到很多。我們不斷面臨奇怪且困難的情境。我們一起合作，年輕的住院醫師及資深的醫師。真的是團隊合作；整個醫院都合作無間，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敵人。

那不容易。我們沒有人準備好面對這樣的事。巨量的工作讓你從情緒面抽離。有這麼多事情要做。即使我們看到很多死亡，我們也拯救了許多性命。為了你試著幫助的病患及其家屬，你會努力堅強。

許多醫師及護士都筋疲力竭，很多人都病倒了。我許多同事從疫情一開始就不曾見到家人。許多人搬到另一間公寓，遠離親愛的人。他們害怕會傳染給家人。

我們獲得社區的大力支持。我們獲得扶輪社及扶輪青年服務社的協助。每天，我們都收到來自餐廳捐贈的餐點，或者是有人訂購比薩送到急診室給我們。這些都是小事，可是知道在這些圍牆外，社區感謝我們每個人所做的事，讓我們很開心。我們感受到他們的謝意。



萊恩·布藍克 Ryan Blancke

公共工程官員
南卡羅萊那州約克
(York) 扶輪社

我是南卡羅萊那州約克郡公共工程部的副主任。我們社區不大；本郡人口為 28 萬 1 千人。我們公共工程部的僱

員比 250 人多一點。在公共工程之下，我們分為道路養護、供水及污水、垃圾掩埋及收集、回收、動物控制、車輛維修等。上述這些都是重要工作。無論是樹倒、下雪、路面結冰、或是疾病流行，我們仍然必須提供這些服務。

今年 3 月，這一帶的病例開始增加。口罩短缺，尤其

是 N95 口罩。我們有 16 個收集點匯集人們送來的資源回收品，我們努力保護那些站在第一線的工作人員，他們不僅要面對人，還要處理他們的垃圾。此時，因為每個人都待在家，會清出大量垃圾，我們的掩埋場及回收中心都已滿載。我們現在無法分類一些混合回收物，因此就把它們送到掩埋場。

「此時，因為每個人都待在家，會清出大量垃圾，我們的掩埋場及回收中心都已滿載。」

有時候我跟別人說我在約克郡公共工程部上班，他們會點點頭，可是通常他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只要你的廁所可以沖水，你的水龍頭有水，有地方倒垃圾，你連想都不會想到它。可是如果那些東西不在，事情就嚴重了。

本區許多餐廳及其他地方現在都提供特惠給護士及前線工作人員。我們的人員沒有人開口要求，可是我知道他們沒有獲得同樣的支持，即使聯邦政府承認公共工程的工人是關鍵基礎建設的重要人物。可是我會說情緒是正面的。他們一直都很優秀。他們只是不斷出現並說：「我在約克郡公共工程部上班。」

維多利亞·沃卡賽克 Victoria Vergara Wocasek

呼吸治療師
華盛頓州第蒙暨諾曼地公園
(Des Moines and Normandy
Park) 扶輪社

新冠病毒最初爆發時我人正在菲律賓參觀我扶輪社的一項水計畫。我到了很偏遠的區域，不太看得到新聞。我開始注意到大家會戴口罩，等到我們回到馬尼拉，才瞭解到其嚴重性。



我在 2 月 10 日回到美國時，大多數的人都說：「還沒流行到這裡。」我回去上班，我們將接受好幾個星期穿脫個人防護裝置的訓練。可是就在訓練的前一天，我們有位病患符合接受新冠病毒檢測的標準，即使他沒有離開過美國。我那天早上在第一次巡房時曾照顧過他。到了第二次巡房時，重症醫師告訴我戴上口罩，因為那位病患正接受新冠病毒檢驗。那就是我開始有真實感的時刻。

「一整個 3 月，我都處於求生模式。我一星期工作 50 到 60 小時。我們都上緊發條，全力以赴。可是真的很駭人。」

一整個 3 月，我都處於求生模式。我一星期工作 50 到 60 小時。我們都上緊發條，全力以赴。可是真的很駭人，回家後我會哭泣。一整個 3 月都難以負荷，垂死的人數暴增。加護病房感覺像是戰場。我們都看見窗戶上標明裡頭的病患是 DNR（不要急救）及 DNI（不要插管）。

我記得一名病危的患者。她的生命支援及用藥量都已經達到最大。她的呼吸器也已經開到最強。她的故事很哀傷，她有好幾位家人都因新冠病毒身亡。有一天我照顧她，隔天我回去時，她已經往生。她很年輕——不到 60 歲——她的門上貼著「不要急救」的標示。

最難承受的其中一件事是疫情對我同事的傷害。大家開始不像原來的自己。每個人都很疲累，筋疲力盡。我們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就都處理過死亡及重症者，可是這件事，實在是難以負荷。現在我認為我們已經習慣了。那就是我們該做的事。



蘿拉·詹寧斯 Laura Jennings

長者服務主任
威斯康辛州日光平原
(Sun Prairie) 扶輪社

我是服務銀髮族的非營利組織——「殖民社」(Colonial Club) 的支援服務主任。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我負責安排所有計畫。我們每天大概都有 20 到 25 個計畫在同時運作。我們也一星期送 5 天熱食，每個工作日還有 30 到 35 個人到我們辦事處內用餐。

在我們關閉辦事處後，我們無法進行那些機構內的計畫。現在我協助送餐的計畫。我們把送餐計畫對全部有需要的老年人開放。我們從一天 100 份餐點增加到將近 160 份。

為了把司機及長者的風

阿露娜·坦提亞 Aruna Tantia

婦產科醫師
印度鹽湖加爾各答大都會
(Salt Lake Metropolitan
Kolkata) 扶輪社

我執業超過 25 年，我可能接生過超過 2,000 位寶寶。在我工作的醫院系統每個月大概有 60 名寶寶出生。所幸目前為止沒有一位母親檢驗出新冠病毒陽性。

我最近穿著全套防護裝接生了一個嬰兒。那是個高風險的妊娠。產婦認為她會需要剖腹產，可是她的產程進展順

利，最後，穿戴著口罩跟防護裝置，我們成功接生了這名嬰兒。那位母親開心不已。

病患都很害怕。其他醫院有一些女性在生产完檢驗出陽性的病例。他們必須把這些媽媽送去指定的新冠病毒醫院，嬰兒則是隔離。沒有餵母乳，完全沒有。你不會想讓嬰兒被媽媽傳染。

我覺得能在這種時候工作很幸運，對社會有貢獻。我真的覺得光榮。這是一段艱困的時光。我不知道何時才能恢復正常。在那之前，病患不能沒人照顧。我們必須先照顧好自己，然後才能照顧病人。



險降至最低，我們改變我們的運送時程。我們不再一星期送 5 天熟食，而是星期一送 2 份，星期三送 3 份。我們以前有 5 名司機，可是多數都是退休人士，他們因為暴露於病毒的風險而停止運送。許多好人挺身而出。現在我們每個運送日都有 12 名司機。好幾位扶輪社員幫忙送餐，我們的日光平原扶輪社還捐獻 2,000 美元給這個送餐計畫。這是真正的社區計畫。

這陣子對於困在家裡的老人來說很難熬。對他們許多人來說，這裡是他們許多人社交的場合。我們想念有他們在的日子。辦公室現在好安靜。我覺得我們仍然在幫助他們，可是我們希望他們能回來。我希望我們回歸正常的日子趕快到來。



比爾·布克 Bill Booker

喪葬公司董事長
阿肯色州小岩城
(Little Rock) 扶輪社

我是羅勒喪葬禮儀公司 (Roller Funeral Homes) 的董事長，在阿肯色州各地經營約 30 家喪葬社。新冠病毒影響我們服務的所有家庭。我們不能容許 5 人以上進入殯儀館內來處理事務，因為我們館內的人數隨時要保持不得超過 10 人。這幾乎就是表示無法進行告別儀式或守靈。

親友死於新冠病毒的家屬在親友病危時無法陪在身旁。那是另一種層次的壓力——死於幾個月前你根本沒聽過的東西，然後面對它可能傳

「我們員工不曾像這次疫情一樣產生這麼大的恐懼及擔憂。」

遍整個家族的情況。那讓人們有壓力。

我們員工不曾像這次疫情一樣產生這麼大的恐懼及擔憂。你擔心把病毒帶回家裡去。我們提供所有員工個人防護裝置，並提供口罩給任何想要口罩的家屬。每個人在儀式期間都戴著口罩。

我的母親在 3 月 15 日因心臟衰竭往生。失去她很難受，可是這讓我得以與其他哀痛的家屬分享我也一樣必須經歷無法讓其他家族成員出席喪禮的問題。人們需要擁抱、握手、注視著彼此的眼睛、流淚、或一起大笑。現在，我們鼓勵大家用飛吻代替。許多人單手撫心，隔著 6 英尺 (1.8 公尺) 交談。

人們問我是否看過好的喪禮。我告訴他們我有，在眼淚與笑聲交錯時。哀悼的一部份不只是和悲傷有關，還與幽默有關。即使是現在，你還是要記得美好的時光。



麥可·萊恩德 Michael Rhind

郵輪幹部
蘇格蘭佛里斯 (Forres) 扶輪社

我在一艘正常時會載著近 1,200 名乘客及近 900 名船員的大型郵輪擔任二副。當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時，我們正從南美洲航向南極洲。起初，我們覺得很幸運——船上沒有病例，因此我們覺得我們是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可是在郵輪公司宣佈全部船艦停止運作之後，我們停泊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在抵達阿根廷前，船上每個人都量過體溫，證明我們很健康，因此他們准許部份乘客下船；其中有些人計畫從那裡搭機返家。隔天晚上的午夜，阿根廷實施全國隔離政策。它關閉邊境，所有航班取消。當時，我們有 200 名乘客在岸上，他們或者必須從機場回到船上，或者就困在阿

根廷。

在這些乘客回到船上幾天後，有人開始生病，沒有國家會准許我們停泊或下船。我們試過蒙特維多（烏拉圭首都）、里約、然後巴貝多群島。巴貝多准許一名重症病患下船，然後在醫療戒護下送至美國治療。最後，在海上漂流近一個月後，我們接近邁阿密，當地准許我們停泊。難過的是，有兩名乘客在我們抵達邁阿密前便已過世。其他病重的乘客則由救護車立即送往附近醫院。

讓 13 名外籍乘客以外的所有乘客下船整整花了 5 天。在那 5 天中，我們時而呼叫救護車，運送生病的乘客及船員到當地醫院接受治療。剩餘的乘客及船員必須留在船上接受 14 天隔離，然後美國才會准許乘客下船。總計，有 6 人往生，包括我們一位年近 50 歲的船員。你可以想像，那大大

影響了船員的士氣。那對我們許多人的心理構成很大壓力。我們困在一個有病毒存在的大型不鏽鋼盒子裡——我們無處可去。

等到我們隔離結束，其餘的乘客獲准下船，可是有 5 名乘客仍不幸無法買到回國的機票。我們也還有來自世界各地數百名船員。因此，郵輪公司提出一個解決方法讓每個人都能回家：本週稍晚，有 5 艘船將在佛羅里達州及巴哈馬群島附近的大西洋聚集，利用我們的救生艇交換乘客及船員。我們的船將航向亞洲，另一艘去歐洲，還有一艘去南美洲。我們會用大巴士把大家都送回家。

我理應在約兩個月前返回蘇格蘭，可是現在我會在船上至少待到 6 月底。我媽媽很擔心我，就像其他媽媽一樣。她問我是否吃好睡好，雖然困在這裡並不算太好，但我知道有人的情況更糟。我有一張溫暖的床、足夠的食物、還有工作。我也很開心能夠服務他人，幫助他人回家。

我通常在船上工作 3 個月，然後休假 3 個月。那就是我為何加入扶輪——當我在家時，我想要做義工。24 歲的我顯然是本社最年輕的成員，可是我真的很喜歡。我之前都是透過 Zoom 軟體從船上以視訊方式出席例會。看到其他社員的臉龐很好，他們總是很熱切聽取我的近況。它給我有點像是家的溫馨接納。

珍·葛茲 Jan Goetz

安寧照顧護士
北卡羅萊那州亞本馬爾
(Albemarle) 扶輪社

我擔任護士 43 年了，也是我第 16 年負責安寧照護。我熱愛我的工作，我無法想像做其他工作。家屬讓我們陪同他們走完這段旅程是一種殊榮。他們讓我們走進他們家，我們成為他們家的一份子，他們也成為我的家人。那不只是工作；那是一種照顧。

病毒來襲，一切都變了。試想像面對一個不治之症。你被告知只剩下 6 個月甚至更少的時間可以活。全家都要面對這件事。他們獲得結論說安寧照護是他們所需要的。他們決定：「我們想要安慰照護；我們只想要享受剩餘的時光。」人本來就很脆弱，突然間病毒來襲。

我們探視的病人多數都在家裡，可是我們也有住在安養院及銀髮族住宅的病人。突然間，這些安養院及銀髮族住宅都封閉了。甚至對我們居家的病患來說，他們的家屬也不會允許他人來訪。我們的病患不僅要面對自己的末期疾病，現在他們還無法與心愛的人在一起。我有一個患有肺部纖維化的病人，她的生活重心就是她的孫子女及曾孫子女，而她有幾個星期見不到他們。那讓我很傷心，因為我們不知道她是否能活到與他們再度相聚。

「我們失去我們工作的人情味部份。我們試著常保微笑，可是戴著口罩很難做到這點。」

身為安寧照護工作者，我們試著保護我們人員的安全。我們想要確認新冠病毒遠離他們住家。因此對我們最困難的點在於無法關懷病患及其家屬。從事安寧照護業的人關愛人類，關愛垂死的人。我們大多數都是樂於表達感情的人。我們抵達一個住所第一件事就是擁抱病患及他們的家屬，而我們現在不能這麼做。

疫情把我們拉開來。我們失去我們工作的人情味部份。我們試著常保微笑，可是戴著口罩很難做到這點。

我們必須夠靠近才能量取病患的生命跡象。我們利用這些時候來靠近人，觸摸他們。那真的是我們擁有唯一的機會。在訪視結束時，我會在安全距離之外，拿下我的口罩。家屬會看到我的臉，我們會相視而笑。可是那不一樣。當我最後離開那戶人家，回到我的車上，我會哭泣。那非常、非常困難。

在這個情況下我不是英雄。我們的病患及我們的家人勇敢面對，盡其所能因應眼前的情況。經歷這一切，他們才是英雄。





蕾妮·理查森 - 溫迪 Renée Richardson- Wendee

銀髮族住宅主任
加州海濱 (Oceanside) 扶輪社

當待在家裡的命令初次頒布時，我突然間從「令人敬愛的主任」變成「典獄長」。家屬非常生我的氣，然而後來他們也看到情況有多糟。

我的住民都是年長者。這裡最年輕的是 86 歲；大多數都已經 90 幾歲。我們目前照顧 8 位生活需要協助、面臨全面封鎖的住民。沒有任何訪客來探視他們。沒有家人可獲准入內探視。對這些住民來說，真的非常、非常難以面對。他們的

生活與女兒、兒子、孫子女切割開來。他們只看得到我和他們的照護者。這實在令人心碎。

他們許多人都很困惑。有一位住民昨天跟我說：「我不喜歡你了。」我說：「為什麼？」她說：「因為口罩，我想要看到口罩後面的臉。」我說：「我不能脫下來。我戴著是要保護你。」另一位有點失智的人認為是她做錯什麼事才必須待在房間裡獨自吃飯。

你走在鋼索上。我們只能在工作地及住家往返。我們無法去購物，因為如果我們把病毒帶進設施裡就太危險了。身為主任，我有家人要照顧、住民要照顧、照護員要照顧，因為他們也都很害怕。加州這裡

有幾間安養院因為員工沒有來上班而必須撤走住民。

我在這個行業已經 32 年。這是我熱愛的事。可是幾個星期前的星期天，我已連續工作 21 天沒有休假，一天 16 小時。腎上腺素會驅動你，可是那個星期天，我起床說：「我必須去上班…可是我無法去上班。」那是一個警訊，我必須設法找出平衡。現在我通常會在 6 點前到家。我試著星期六、日只工作 4 小時左右。

我們開始進入正常的模式。前幾個星期很混亂，可是現在比較像是例行公事。我們在住民的房間和他們玩遊戲。我們引進更多工作人員，以便有人可以推著輪椅帶住民出去散步、坐在玫瑰花園裡、或是與他們玩「過十關」(Phase 10) 卡牌遊戲。有些住民已經慢慢習慣，可是患有輕微失智者沒有辦法。每天對他們來說都是新的。你必須再三解釋：「不。我們沒有生病。你沒有生病。我們戴口罩是因為我們不想要有人生病。」

世界的其他地方將慢慢鬆綁重啟，可是我認為他們會讓長者設施保持一定的封鎖。我不知道會不會都這麼嚴格；可能有機會他們會說：「好的，各家屬如果戴手套及口罩，如果你們相隔 6 英尺遠，是的，我們可以讓你們進來。」可是這個年齡層是最容易受傷害的。如果病毒進來這裡，這些住民可能就活不久。

強卡羅·葛拉西 Giancarlo Grassi

街友援助組織主管
義大利巴勒莫競技場劇院
(Palermo Teatro del Sole)
扶輪社

我是一家服務街友及城市貧民之非營利組織的主任。它是由巴勒莫一帶的扶輪社所創立的。我們準備及分發餐點，收集衣服等必需品，並利用配備有自來水的廂形車提供

淋浴服務。這一切不曾改變，改變的是我們因為新冠病毒而服務更多人。

我們以前每星期服務 25 到 30 個家庭。現在是 100 個，總計大約 300 人。其中許多人都是靠非正當的工作來賺錢，然後因為封鎖禁令而丟掉飯碗。因此，我們的困境不只是在封鎖期間如何解決服務的後勤問題，還要處理需求人口增加。



我們新增服務的家庭有些是待在自己家裡，因此扶輪社員不是替他們煮飯，而是騎摩托車替他們送食物。我們也和市政府合作幫助人們填寫表格領取食物券。大家不能像以前一樣去市政廳，可是我們能夠接觸到他們。

在義工開始戴著手套及口罩出現時，我們服務的對象也瞭解到事情的嚴重性。他們以前會擁抱我們來表示謝意。現在他們不能。我認識的參與這個計畫的人當中，沒有人感染新冠病毒——義工沒有，我們 80 位受益的街友也沒有。我們採取的預防措施有效果。

「我們有 80 名扶輪社員，外加 50 名非扶輪社員組成一個服務網絡。最近，這個數字增加。」

每次我們聚在一起服務，我很可能會在那裡。當我們發放衣物及用品，我在那裡。當我們開著行動淋浴車四處繞，我在那裡。當我們整理食物堆到摩托車上來運送，我在那裡。可是我不是一個人：我們有 80 名扶輪社員，外加 50 名非扶輪社員組成一個服務網絡。最近，這個數字增加。人們主動來電詢問我們是否需要協助。通常有 3 個人騎摩托車四處送食物。今天，有 10 個人。大家都想要幫忙。